

“写作者的能力就是深潜的能力”

——访作家罗伟章

□白浩



《镜城》，罗伟章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7月

白浩：刚读了你的中篇小说集《镜城》，读这部作品，我确实深刻地感觉到你是一个不愿被定义也不能被定义的作家。这部集子里的六篇小说，与《我们的路》《大嫂谣》《奸细》时代的罗伟章迥然有别，与《谁在敲门》《尘世三部曲》也非常不同，你觉得不断变化对作家意味着什么？你自己更欣赏哪一个罗伟章？

罗伟章：对一个作家来说，变是危险的，特别是，如果这个作家某一个阶段的写作已比较成熟，而且也得到了了一定程度的认可，再去变，就可能自绝于坦途，走上“不归路”。但写作的快乐和艺术的本质，又都与变结盟最深。变不等于创新，许多时候，我们以为变化就是创新，那是奢谈创新。小说发展到今天，各式各样的叙述策略都被尝试过了，且都有了杰作，想创新是难的；当然也因为难，才吸引着那些有志向的作家，前仆后继地试图去克服难度。创新难，变化是可以的，它代表了一个作家不满足于一种模式，希望自己有可能性，而且也是不断地调试，看哪一种表达与自己更加契合，更能抵达完美。

我说不上更欣赏哪一阶段的自己，我依然在尝试。

白浩：你多次强调小说“种子”的意义，你能就这部集子里的作品具体谈一下吗？

罗伟章：比如《将近两千年前的一桩悬案》。

这篇小说取自《三国演义》。印象中，《三国演义》我大概读过三遍，第一遍读到刘安杀妻那一段，很为刘安感动，那时候年龄还比较小。第二遍读，已经上了大学，再读到刘安杀妻，就有些不舒服，眼里老是出现那个被杀的、沉默的、无名的人。大约十年前，有天突然想起那一段，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应该写个小说——就为那个无名者。但一直也没写。前两年第三遍读，就觉得非写不可了。仿佛落着大雨，四野无人，只有那个无名者，在雨里淋着，彷徨四顾地走着，脚步蹒跚，目光锐利而忧郁，我再不写，她就不能从雨里出来，或者说，她的天空就不会晴朗。

再比如用作书名的《镜城》。30年前，我当时的单位有个人离职了，半年后回来，说自己在北京一家公司写剧本，说自己在那公司很吃香，是个骨干。这让我惊讶。他在单位上烧锅炉，平时没听说他能写，更没听说他写过什么。那时候我是单身汉，他爱到我寝室来聊，有天他来告辞，说又要上北京去了，同时带来一篇他新写的文章，写在学生作业本上，只有半页，我当即看了，几乎没有一句话是通顺的。这让我为他悲凉起来，我知道他不可能进什么公司，更不可能成为骨干，他只是用想象为自己塑造了一种生活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见过他，也没有他的消息，但他一直搁在我心里，有天想起来，就写成了这个小说。

这些都是种子，你也看出来，是不同类型的种子。

白浩：发表于《钟山》的《镜城》，获了很多奖，有颁奖词说，《镜城》“在个人遭遇与国家历史的回忆和想象中，书写了现实逻辑与历史悖论的互为纠缠，精神寄寓和价值归宿的自我诘问”，而你取材的“种子”是那么大，是怎样让一粒小种子长成一棵大树的？你如何评价主人公陈永安这个人？

罗伟章：当一个人开始自我审视的时候，身份再卑微，也有精神的巍峨。陈永安这个人，当然不再是30年前我那个同事，他有了更丰富和更宽阔的维度。他在现实中梦想，却并不因梦想而看轻现实。现实是他必须面对、必须应付的，但梦想也是他的权利。他的生活很不如意，在困境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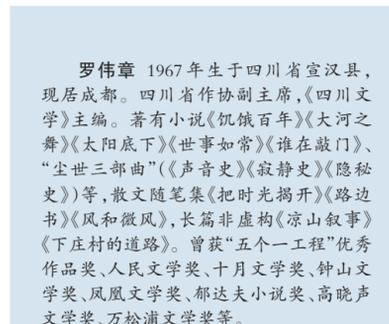
挣扎，挣扎无力，就用长梦去实现，这也是一种人生。人生并非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，更不只是让告上的部分，还有很多潜伏起来的部分，潜伏起来的部分更复杂更深邃，写作者的使命，就是打捞出那一部分。写作者的能力，也就是潜水的能力。

白浩：《逆光》这个小说似乎有《谁在敲门》的笔法，在作家的凝视当中，一粒土块也能成为旷野，万般心事蔓延生长。《北京文学》中篇小说颁奖词中说，《逆光》“重新阐释中国式家庭伦理在时代语境中的嬗变，仿佛切开城市一角，四两拨千斤，是时代的浮世绘……貌似生活流的叙事里，饱含着戏剧性，暗藏着象征性”。你如何看待小说的速度和象征？

罗伟章：当列车提速，当地球成为“村”，当网络空前发达，空间感就从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，作家们所依赖的陌生空间里发生的陌生故事，已经失去了效用。这就要求作家写出别样的小说，在看似千篇一律的生活细节里去重新发现，重新建构一种小说范式。这种小说拒绝快阅读，不能静心，就不能阅读，而一旦静心，就能读出平时没有在意和随手丢弃的痛和爱、阴影和光明。这类小说是主动的——主动选择读者。至于小说的象征，任何一种风格的小说，只要写好了，都会构成象征，因此象征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。

白浩：《从第一句开始》这篇作品，写一个小知识分子怀揣理想，却无法融入现实，而在逃离现实的途中，又并未获得理想主义意义上的新生，差一点“被打死在书桌上”。批评家郭艳在评点这部小说时说，该小说塑造了一个“非典型性人物”，同时又认为这个人物：“其实是千千万万个曾经的你和我。潮流中行走的我们却往往不在时代之中，走丢的是时间，记忆还是曾经被时间和记忆赋予的意义？”这样说来，又不是非典型，而是典型的了。你怎么看？

罗伟章：小说是怎样写的，我就是怎样看的。我们很容易就融入潮流了，那是从众的道路，也是利己的道路，人当然要选择安全的道路，这是天性使然，因而是无可指责的。但也恰恰因为这



罗伟章 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，现居成都。四川省作协副主席，《四川文学》主编。著有小说《饥饿百年》《大河之舞》《太阳底下》《世事如常》《谁在敲门》《尘世三部曲》《声音史》《寂静史》《隐秘史》等，散文随笔集《把时光揭开》《路边书》《风和微风》，长篇非虚构《凉山叙事》《下庄村的路》。曾获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钟山文学奖、凤凰文学奖、郁达夫小说奖、高晓声文学奖、万松浦文学奖等。

样，我们更需要一种光彩，这种光彩是由很多要素组成的，比如温度、细节、触感以及抵达心灵又照亮远方的情怀和理想主义。这些实在是太要紧了，但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。当我们忽略掉这些，生命里还剩下什么呢？确实就是在潮流中而不在时代里了。“潮流”这个词，往往与“席卷”联系在一起，如此，生命过程就被空置，过程空置，时代便与自己无关。理想主义缺失，就可能出现两种人生，一是沉重，二是虚无。对一个时代而言，也是如此。那个小说中的“我”，非典型性是显性的，典型性是隐性的。郭艳的评点我也看了，她说：“现实生活中，更多的‘我’连南下创业和拒绝平庸的勇气和想法都不曾有，就已经在理想和现实的两个维度铩羽而归了。”说得好。从这个角度讲，的确又是非典型性的。

白浩：《白鸟》是一个奇特的小说，是一个“在路上”的小说，但最后，路断在荒岛上，茫茫大河成了唯一的路。读这个作品，我感觉在不断进入生命内部，那里荆棘丛生，越深入越觉得胆怯和疼痛，但那偏偏又是生命的本质，因而也坦荡和宽宥。我觉得，这篇《白鸟》与《名人》形成了意义上的互文关系。

罗伟章：你说得对。我自己也比较喜欢《白



岛》。我有个长篇叫《世事如常》，《白鸟》是从这个小说“溢”出来的部分，不是故事本身，而是情绪，或者说对世事的观察。《白鸟》里的人物，始终在探究生命，《名人》里的人物则是努力在经营生活，他们刚好形成对照。

白浩：我关注到不少批评家谈论你的语言，认为你的语言不是你写出来的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，这是相当高的评价。你如何看待小说的语言？

罗伟章：语言不是语言本身的面貌，而是视野的面貌、思维的面貌、情感的面貌、境界的面貌。比如，一个有语言羞耻感的人，羞耻感不只在语言上。个体是这样，整体也是这样，如果研究一个时代的俗语和流行语，定能有效考察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精神质地。作家应对语言担负使命，好的语言是有香气的，读有些作家的作品，能分明闻到语言的香气。或许，在我的观念里，庄严应成为语言的底色。庄严不能伪装，想伪装也伪装不来。有些作品通篇插科打诨，用语不避俚俗，却让我们读出了富有力量的生活，读出了语言的美；有些作品满脸正经，却显得粗鄙、卑琐和狭隘。所以语言不只是语言的事。（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中国男足在当下的语境里，兴许是一个不讨好甚至有点遭人诟病的话题。因此，在从事写作的10余年里，从未动过创作此类题材的念头，即便我对中国足球的历史谙熟于心。这个“世故”的想法在2022年2月1日深夜被颠覆，原因是中国男足在这一天1:3输给越南队。这是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亚洲赛区十二强的比赛，可谓举国瞩目。而这一天偏偏又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。

当比赛进行到“留给中国男足的时间不多了”的阶段时，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李惠堂、陈镇和、谭江柏等人的画面，这群热血男人曾经在十届远东运动会上9次夺得冠军；这群男人也曾一路踢着比赛换取船票，参加了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，并在第一场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赢得世人尊重；更让人感动的是，在国难当头时，这群男人挂靴从戎，奔赴战场。随着比赛终场哨声响起，我决定终结那些“中国男人不适合踢足球”的奇怪言论，重现80年前中国足球荡气回肠的一幕。

比赛结束后，我给演员万弘杰老师打了一个电话，讲了我的想法。恰好万老师也刚看完比赛，我们俩可谓一拍即合，甚至筹划着自己来操盘这部电影。万老师这些年基本淡出演艺圈，一心一意做编剧、做导演。在接下来虎年的正月里，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，很多新发现让我们禁不住竖起汗毛：当我们需要爱情时，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参赛名单里发现了女子游泳运动员易梅；当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大事件，来支撑最后一场比赛时，发现东江纵队营救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的时间恰巧吻合。如何把李惠堂主导的这场比赛与廖承志策划的大营救勾连在一起？我们发现李惠堂的女朋友竟然也姓廖。而香港沦陷之前，廖月英正帮助李惠堂在香港进行抗日募捐……一切仿佛都是天意。

有了天赐一般的素材，我们用了一个月时间，便搭好了《为国争》剧本的故事框架。但当时正处于疫情期间，影视行业都在停滞状态，基本无法进行下一步工作。于是，我又用了一年时间，把这段历史写成成长篇小说《为国争》。

小说《为国争》的故事脉络，在电影剧本三场比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场战争，还有男主小北“千里送抗日英雄骨灰”等细节。在我的写作生涯里，《为国争》是我第一次与史实环环相扣的一部作品，虽说查阅大量史料的工作沉重又繁杂，却也体味到了“史海钩沉”的乐趣。

除主要人物李惠堂、陈镇和、谭江柏之外，小说还塑造了一正一邪两位男主，小北和余伯庸。在相对和平的年代，不是每个男人都会有机会身披国家队战袍、为国家荣誉征战的。历经三年磨砺，在小北还未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时，抗日战争便爆发了。滞留在香港的李惠堂、廖月英和易梅走上街头，进行抗日募捐。谭江柏则加入十九路军，成为滇缅公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。彼时，日军

重塑中国足球的荣耀与使命

小说《为国争》创作谈

□余耕



《为国争》，余耕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7月

封锁了中国的海上运输，所有国外援助的抗日物资，只能依靠滇缅公路运进中国。在赛场上有“谭钢头”美誉的谭江柏，在滇缅公路上依旧保持着他的钢铁意志，不舍昼夜地奔波在这条时常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抗日物资生命线上。后世的人们很少有人知晓谭江柏，但是肯定知道谭江柏的儿子，他就是香港歌星谭咏麟。

也许是宿命使然，在足球场上被誉为“飞将军”的陈镇和，在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国空军。由于机型落后，日本空军掌握绝对制空权。即便如此，陈镇和所在的飞行中队在数次对敌作战中，前后击落5架日本战机。在一次从新疆驾驶苏联援华战机返回基地的任务中，飞机突然发生机械故障，陈镇和殒命长空，成全了他在足球赛场上的勇猛球风。

每每想起这群可歌可泣的中国足球运动员，我都会禁不住泪目。他们在赛场上勇猛无畏，视和平竞赛为无上荣誉。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，视国家大义为无上责任。反观当下的足球人，有人花钱就能买下一个国家队的位置，胸前的“中国”二字再无神圣和荣光可言。前后相距80余年，对足球运动的理解、对荣誉尊严的认知，我们非但没有进阶，反而日渐沦落。对比昔日的足坛前辈，怎能不让今人唏嘘慨叹。

我在北京做过十几年体育记者，对于日渐没落的足球运动曾经做过一些思考。按照一般规律来看，一项体育运动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步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经济取得长足进步，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，简直天壤之别。反观我国男足的成绩，却从亚洲一流水平跌至今天的三流球队，这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。在前不久的美加墨世界杯亚洲预选赛抽签中，我们的男足竟然以亚洲第五的球队分列C组。即便能够参加亚洲区18强预选赛，也是凭借新加坡队门将的出色表现，勉强跻身亚洲18强。

这些年来，国家对于男足的投入远超过其他集体竞赛项目，甚至花费天价请来世界顶尖水平的足球教练，运用经济手段归化外籍足球运动员。

80多年前的中国足球队，他们甚至凑不齐统一的参赛足球鞋，可他们仍然把国家荣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。在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，中国男足再次战胜日本队夺冠，夺冠后的中国男足没有退场，而是全体队员走到球场中圈，拉起“坚决抵制伪满洲国参赛”的横幅。在1936年前往欧洲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时，中国足球队来回经费需要22万元，国民政府只划拨17万元，球队迫不得已已在奥运会开赛前三个月便启程上路，一路上踢了20多场比赛，靠着球票分账才抵达德国柏林。长途跋涉、一路征战的中国足球队，在柏林奥运会首轮比赛中遇到世界强队英格兰，居然在上半场与英格兰队打成零比零。中国足球队虽然最终输掉这场比赛，却赢得了世界足坛的尊重，甚至有欧洲俱乐部向队长李惠堂发出邀请，让他去欧洲踢职业比赛。

《为国争》的写作过程始终充满激情与感动，下笔之前我甚至能够“复盘”三场比赛全过程，仿佛亲眼见证过这三场比赛。尤其是最后一场杜撰的比赛，为把比赛拖进加时赛，为东江纵队大营救争取时间，李惠堂不得不在艰难领先的有利局面下，为日本队创造进球得分机会。我想，肯定要有人为最后一场比赛背负些什么，那只有球队的灵魂人物李惠堂，因为东江纵队营救计划只有他和廖月英知道。当营救队伍的信号弹跨过深圳河、传到体育场的时候，当李惠堂呼唤队友全力以赴进攻的那一刻，我几乎是全身汗毛竖立着写完这个章节的。尤其是余伯庸倒在赛场上时，这个又胖又秃又爱钱的男人，最后映入眼帘的是他撒出去的钱币，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想用抗战胜利时广州街道上欢呼的人群做背景，小北走在他曾经行乞的街道上，做这部小说的结尾。但是余伯庸倒下那一刻，我觉得情绪渲染到了最高点，于是，我决定在这里收尾。此前我一直担心，杜撰出来的小北和余伯庸会不会配不上这群足球英雄？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小乞丐，一个是贪财爱色的大赌徒，二人会不会淹没在群雄的光环里？直到这部小说写作的最后一刻，直到泪水跌落在电脑键盘上，我一直悬着的心才踏实地坦然起来。

之所以把80多年前的这段足球往事呈现出来，绝无厚古薄今之意。我们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财力物力人力再也不是足球运动发展的羁绊。我们充裕的物质生活，足够五代不缺任何营养的足球后备人才成长起来。可我们的足球成绩为什么逐年没落，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。待《为国争》截稿后，我想当下的中国足球运动员身上大概是缺了骨气和格局，那是为荣誉而战的骨气，是长久发展和传播这项运动的格局。

李惠堂、陈镇和、谭江柏、曹桂成、冯景祥、包家平、黄纪良、李天生、黄美顺、孙锦福、蔡文礼、麦兆汉、贾幼良、徐亚辉、杨水益、卓石金、张显源、郑李良、梁荣照、梁树棠、叶北华、李国成……仅以这篇创作谈，向这群有肝胆、有骨气、有格局的足球人致敬！

《为国争》(书摘)

□余耕

小北把位置往前挪，徘徊在中场附近。就在这时，谭江柏在禁区内一个倒地铲球，干净利索地破掉日本队一次有威胁的进攻。被谭江柏铲掉的球正好飞到樊德云脚下，樊德云一个大脚长传给中场的小北，小北把球卸下来，快速往前蹬去，眼前一片开阔地。就在小北启动奔跑时，他才感觉到浑身痛楚，这些天来被日本特务酷刑折磨的伤痛显现出来。小北咬紧牙关，以全速往前奔跑。在小北的身后，3名日本球员疯狂追赶，但始终距离小北一步之遥。小北虽然已经数年不踢球，加上他身体受到酷刑折磨，但是速度优势依然在，就在他把球带到禁区前沿准备抬脚射门时，一名日本球员倒地飞铲到小北脚踝上。小北还没有触碰到足球，身体便前倾倒在禁区里，他蜷缩起受伤的那条腿，在禁区内痛苦地翻滚着。西看台上的观众集体发出一声惊呼，纷纷站立起来等待英国主裁判判罚。

英国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，只是给那名倒地铲球的日本球员进行一番口头警告。西看台上一片哗然，大家叫骂着“黑哨”。被主裁判警告过的日本球员跑到小北跟前，伸出手来拉小北，被日本队场上队长大声呵斥，并上前给了那个球员一记耳光。被警告的日本球员赶紧冲着场上队长立正鞠躬，并迅速回到自己的半场。小北突然觉得这个球员有几分眼熟，他迅速记起来，眼前这个球员就是在广州跟他一起踢过球的日本士兵。

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小北没有回撒防守，他继续留在中场附近等待机会。日本队已经教了小北的速度，不敢再全线压上进攻，中华足球队后防线上的压力顿时减轻不少。临近中场时分，中华足球队得到一次角球机会，孙金辉开出的角球找前点的谭江柏，“谭钢头”不负厚望，一记狮子甩头，足球洞穿日本守门员十指关，将比分改写成一比零。

中场休息时，冈山堃一在日本队休息室里，连续叫了守门员十几记耳光，还责骂他应该剖腹谢罪。日本球员全都低下脑袋，大气不敢出一声。冈山堃一虽然许多年不踢球了，但是日本足球队都知道他的火爆脾气，曾经有一次因为裁判判罚，他差点把裁判掐死在赛场上。升任军方高官之后，他把日本足球队全部调至麾下，安排进宪兵队。一是便于组织训练，二是不用上前线打仗，日本足球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。

冈山堃一环顾四周后，开始布置下半场战术：“战争年代的足球比赛就要有战争年代的打法，每一脚出击，不管是球还是人，都要踢到一样，因为所有规则都是胜利者制定的。这场比赛踢完，你们这些人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被嘉奖，要么被送上军事法庭。”

中华足球队休息室里，也是只有李惠堂一个人在讲话，因为其他人累到不想讲话，都在“呼哧呼哧”大口喘着粗气。因为廖月英不在场，队员们也不便询问，只好相互之间按摩放松肌肉，准备下半场的比赛。

李惠堂大声鼓劲道：“防守是保不住胜利的，我们还是要瞅准机会大胆进攻，后场拿球后，第一点就找小……陈镇北，不要怕失误，十次失误也不要紧，只要陈镇北抓住一次机会，就能扩大战果。”

下半场比赛开始了，日本队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，动作幅度都很大。已经有两名中国球员被日本球员踢伤倒地，但日本队没有遵循把球踢出界外的比赛惯例，而是继续往前推进。西看台上的香港球迷高声呐喊，谴责日本队违背体育比赛精神。其中一名中国球员伤势严重，似乎是被踢断腿，站起来两次重又摔倒在地。李惠堂无奈，只得换上另外一名，也是除了自己之外的唯一一名替补球员。借着中华足球队调整场上阵容之际，日本队从右边路发动一次进攻，一次下底传中，后面冲上来的球员把球踢进中华足球队的大门，双方比分变成一比一平局。

中华足球队迅速做出调整，谭江柏、樊德云和孙金辉三员老将坐镇后防线，中华足球队很快稳住阵脚，继续贯彻李惠堂打防守快速反击的战略战术。终于，在比赛进行到接近80分钟的时候，谭江柏一记长传吊给小北。此时，小北越来越觉得身体虚弱，突然得到球后竟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。即便如此，小北还是爆发出全身的力量，他甩开最后一名防守球员后直接面对守门员，一脚将球踢进球门死角。

剩下不到10分钟时间，中华足球队二比一领先。西看台上兜售盘口筹码的余伯庸，此刻心情有些复杂，他内心希望中国队赢球，但是就中华足球队目前的实力状况来看，输掉这场比赛是在情理之中。因此，余伯庸在西看台上只卖中华足球队赢的筹码，目的就是想吃割一波爱国球迷的韭菜。但是，一旦中国队赢得比赛，他将会赔掉底裤。

这时候，场上也出现状况，谭江柏和樊德云先后腿部抽筋倒地。一名日本球员以为中国球员故意拖延比赛时间，跑上前去冲着倒在地上的樊德云后腰踢了一脚。瞬间，双方队员纠缠打斗在一起，主裁判加上两个边裁冲进场内，才把双方球员拉开。就在双方球员撕扯的时候，廖月英拎着急救药箱从体育场大门口冲进来。她直接跑到中华足球队队员席，气上不接下气对李惠堂说道：“他们……还没有过深圳河，一位作家……走到半路上……才想起装手稿的箱子落下了……廖先生让你……让你把比赛拖延进加时赛。”